

# 梓潼县先锋村无铭阙阙主考

孙 华 (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摘要: 四川梓潼县先锋村无铭阙主人到底是谁, 长期以来众说纷云。作者经过考释, 认为该阙主人为雍氏, 其年代为东汉桓帝时期或稍早。

关键词: 梓潼; 无铭阙; 考释

中图分类号: K87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08)03-089-03

在梓潼县旧城西门外约 0.5 千米处, 有一座残损的石阙高耸在川陕公路旁。由于只保留下了左阙的附阙, 没有阙铭可以判断其主人, 通常将其称作“无铭阙”(当初公布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时就这样命名该阙)。四川的无铭阙很多, 在确认该阙的主人之前, 为了便于分辨, 我们还是按照考古学上遗址命名的惯例, 用该阙所在的小地名即梓潼县城关镇的先锋村来命名, 称之为“先锋村无铭阙”。

阙在潼江左岸二级台地的边缘, 阙下就是宽阔的一级台地。由于特大洪水可能会淹没一级台地, 这层台地上没有永久性的房屋和村落, 现在一级台地上都是种植蔬菜的菜地。县城及城关的房屋基本上都坐落在二级台地上。

该阙东面紧邻潼江, 该阙所饰的墓葬不可能在会被洪水湮没的一级台地上, 其朝向只能是面朝潼江、背靠县城, 也就是东西向。阙的北(右)阙已经不存, 从县城西门通向潼江的道路从南(左)阙的北侧, 也就是南北二阙之间神道的位置通过。看来从立阙后不久直到近现代, 县城通向潼江河畔渡口的道路是大致相同的。今仅有南(左)阙的阙基及附阙尚存。

阙的阙座残存二石, 由阙的结构分析, 原阙座应为三块石条平铺而成。阙座四周刻以斗子蜀柱, 使之呈平座形状。残存的附阙阙身大半坐在阙座上, 少半直接落在地基上。附阙残高 334、宽 112、厚 66 厘米, 其阙身由五层条石垒成, 阙身上刻方柱, 柱上贯以阑额, 使之呈面阔二间, 进深一间的形式。阙身上为斗拱部分, 该部分由两层条石组成: 下层刻栌斗和三层纵横相交的枋, 上层刻一斗二升式斗拱。斗拱以上是阙楼部分, 该部分也由两层条石叠成, 其下层是与斗口枋平齐的一层宽大的枋子, 上层为下小上大的

斗形的斜撑。斜撑上承阙顶, 阙顶风化残损严重, 仅有檐下部分椽子尚模糊可辨<sup>[1]</sup>。

阙无铭文, 又不明见于清代以前的文献及金石学著作中, 其阙主为何人, 现在已难以考证。清咸丰八年修《梓潼县志》(卷 3)说“汉边韶(孝)先墓”在“县西关外”。似乎就是指此阙而言。然而, 据《后汉书·文苑传》, “边韶, 字孝先, 陈留浚仪人也。以文学知名。……桓帝时为临颖侯相, 徵拜太中大夫, 著作东观。再迁北地太守, 人拜尚书令。后为陈相, 卒官”。边韶既不是梓潼人, 又没有死在梓潼, 绝对没有葬在梓潼的道理<sup>[2]</sup>。宋陈思《宝刻丛编》卷一记开封县碑刻有“汉边韶碑”, 碑“在开封县东北五里墓前”, 这里还有边氏家族其他人物的墓葬和碑刻。因此, 把梓潼县这座无铭阙当作边韶墓阙的说法, 无疑是错误的。

先锋村无铭阙不是边韶即边孝先阙, 但该阙被误认为是边孝先阙却不是没有来由的。至迟在宋代, 边孝先就已经与梓潼扯上了瓜葛。宋人祝穆的《方輿胜览》卷六十七隆庆府梓潼县人物门就有边孝先, 说他“居梓潼县南五里长卿山”。清咸丰《梓潼县志》说长卿山西崖相传是“司马相如、边孝先读书处”, 就是这些传说的衍化。以后地方志记载的梓潼城西门有边孝先墓, 也不是全无依据。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讨论, 如果先锋村无铭阙真是边韶(孝先)的墓阙, 那么为什么后来的人们不称边韶之名而偏偏要称呼他的字呢? 二是边韶的活动足迹并未到达四川, 《后汉书》又是最常见的史书, 人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古人仍然持梓潼有边孝先遗迹的说法呢?

在宋人章炳文《搜神秘览》中, 记载有这样一个志怪故事: “西川费孝先善轨革, 世皆知

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货殖至成都，求为卦。孝先曰：……。”<sup>〔3〕</sup>这个名为费孝先的西川人，据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三“费孝先卦影”条，为北宋政和前后的成都人，他自称在青城山遇一异人传授“轨革卦影之术”，并以此预测人们未来祸福而致富，成为许多人效法的名人。费孝先死后，“四方治其学者，所在而有，皆自托于孝先，真伪不可知也。”费孝先或自称为费孝先的人居住在梓潼城西门外的长卿山上，死后又葬在这里都是完全可能的。费孝先的“费”字与边孝先的“边”字古音相近<sup>〔4〕</sup>，我怀疑梓潼地方志所说“边孝先”是“费孝先”之误。不过，这个费孝先是北宋代的术士，如果他曾经居住在梓潼县西门外潼江对岸的长卿山上的话，他死后的墓葬也应当在那里。无论从时代还是从地点来说，梓潼西门外的先锋村无名阙都不可能是费孝先的墓阙。

既然先锋村无铭阙既不可能是边孝先墓阙，也不可能是费孝先墓阙，那么其主人应当是谁呢？我在调查测绘梓潼诸阙时，曾经注意到，现在梓潼城西的先锋村无铭阙和城北的所谓“杨公阙”在保存形态上存在着互补关系——先锋村无铭阙只保留了阙基和附阙部分，“杨公阙”只保留了主阙的阙身部分。考虑到梓潼城北的“杨公阙”曾经数度搬移过位置，我曾经考虑过，是否“杨公阙”就是先锋村无铭阙的主阙，后来被人从西门外搬移到北门外，从而造成一阙两地的状况？不过，这种推测很快就被自己否决了，因为“杨公阙”尽管搬移了数次，但都是在北门外移动，没有从西门外移动到北门外的说法；再说，如果从保护文物的角度搬动一处石阙，也不大可能只搬走主阙的阙身，而将阙基和附阙留下不搬的；更主要的是，“杨公阙”阙身较小，先锋村无名阙的附阙则很高大，把这两处残石阙拼凑起来，组成的完整石阙，其主阙和附阙比例不协调。因此，先锋村无铭阙不可能是“杨公阙”的一部分，这是可以肯定的。

先锋村无铭阙虽然不是“杨公阙”的一部分，但并不等于说它与“杨公阙”没有关系。清代以后被称作“杨公阙”的石阙是位于今梓潼县城北关外的一座残阙，因阙身原刻有“蜀故侍中杨公之阙”八字(今“杨”字已不可见)而得名。该阙原在县城北门外约1千米的宏仁堰，上个世纪50年代初因建设搬迁至宏仁堰管委会，1964年又搬移至今址即城关镇七居委北400米处即外北街西侧<sup>〔5〕</sup>。搬迁“杨公阙”是为了给小型水利工程让出地方，因为是人工搬运，搬迁挪动的距离都不远，阙的位置仍然在梓潼城北门外不远

处。这座位于梓潼县北门或东北门外不远处的石阙，清人著述称之为“杨公阙”，至于其阙主，根据阙铭的国号和官职，清人有三国时的杨修、杨戏和成汉时的杨发三种推测<sup>〔6〕</sup>。这些推测实际上都是以后人补刻的阙铭为前提而作的假设，没有一种能自圆其说。关于“杨公阙”为杨修阙的意见，清咸丰《梓潼县志》卷二已经提出了疑问：“又城南(为“北”字之误)有故蜀侍中杨修杨公石阙，即《县志》所载杨修墓。考杨修西安同州人，在汉依曹氏不得称蜀，是否一人，不敢臆说”。关于“杨公阙”为杨戏阙的说法，清人陆增祥在《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中反驳道：“冯氏疑为杨戏之阙，姑勿论其是否为侍中，茫无可证，凡志铭碑碣，统书其人最后之职务与夫追赠之官，杨戏以梓潼太守入为射声校尉，则当以校尉题之，不应以曾为侍中，遂书侍中也”。至于“杨公阙”为成汉时期杨发阙的说法，正如同陆增祥怀疑“贾公阙”阙铭为宋人所题时指出的那样，“李雄僭即帝位，……建国曰大成，后改号汉，而此刻首题曰蜀”。成汉的侍中杨发之墓即使立阙的话，其阙铭也应当称“成”或“汉”而不应当称“蜀”。事实上，梓潼县三处有铭文的石阙，其铭文都与清代以前文献的记录不同，它们都是明代以后梓潼县的某位好事者所为<sup>〔7〕</sup>。

在梓潼县北门外即东北门外，明代及其以前文献记载的石阙只有东汉赵国相雍劝阙。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六利州路隆庆府碑记目记载，梓潼县有“后汉赵相国雍墓石阙”，该墓阙“在梓潼县北二里，前有石阙、石麟，其文曰：‘汉赵相国雍府君之墓。’”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之二十六保宁府三梓潼县：“《志》又云：‘县东北有二石阙，……其一题曰：汉赵相国雍府君之墓。’”在本来应当是东汉赵国相雍府君阙的地方，清代以来却变成了“蜀故侍中杨公之阙”，显然，清代以来的所谓“杨公阙”应当就是雍府君阙。

汉赵相国雍府君阙，据宋·洪适《隶释》卷第十二载《赵相雍劝阙碑》铭，也就是雍劝。根据碑铭，雍氏家族世系为：“高祖父讳宝，字伯著，孝廉、河南令、侍御史、九江太守。

君子望，字桓伯，右校令。望子陟，孝廉，胸忍令，。陟弟朗，字仲旁，孝廉，弘农令，武都太守。朗弟劝，字叔，孝廉，成臯令，赵国相。劝子煜，字稚，孝廉，资中长江令，都尉。自右校君以旧墓在水阙而坟墓多，地势斯造坟垅，树碑铭。至赵国府君，在官五载，莅政清平，有甘棠之化。年四十五卒于官，故吏民汉中太守邯郸等慕

恋恩德，刊石称颂焉。”雍姓为汉晋时梓潼县的豪族大姓，根据上引碑铭，雍氏旧墓地在河边，受地势限制，当坟墓增加到一定数量后，已经无法容纳新的墓葬了。所以，到了雍劝父亲雍望（即碑铭所称“右校君”）的时候，就在现在的地点营建新的墓地。这里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雍氏墓地有两处，其新、旧墓地不会相去太远。梓潼旧城东六里有范氏墓地，南四里有李氏墓地和邓氏墓地，它们的方位和距离都与北门外的雍劝阙没有任何联系。距离被误称作“杨公阙”的雍劝阙最近的就是先锋村无铭阙，其位置与雍氏旧墓所在相合。

二是雍氏先前的旧墓地在水滨，梓潼县城附近只有潼江一条河流，先锋村无名阙正好位于潼江之滨，其地理环境与碑铭所说雍氏旧墓的环境相符。

三是雍氏高祖雍宝官至九江太守，太守墓用带附阙的双出阙，这也符合制度，与先锋村无名阙的形制相吻合。

既然先锋村无名阙其地理位置与雍劝阙不远，其地貌特征与碑铭所记雍氏旧墓相合，其阙体建筑也符合雍氏高祖的身份，因此，我有比较充分的理由推断先锋村无名阙就是雍氏旧茔的墓阙。

雍氏旧茔埋葬的雍氏高祖雍宝，其人不见于汉代文献记载。雍氏新茔埋葬的雍劝，其人虽不见于《后汉书》等史籍的记载，但他的长兄雍陟却见于汉晋文献之中。宋人洪适《隶释》卷第十二所载《赵相国雍劝阙铭》只是说雍陟曾为“孝廉，胸忍令（下缺五字）”，最后的官职和生卒年均不详。然而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迄灵帝熹平中，蛮夷复反，拥没益州太守雍陟……（李）颙将巴郡板楯军讨之，皆破，陟得生出……梓潼景毅为益州太守”的记载可知，雍陟的最后官职当为益州太守，《隶释》所载雍劝阙铭中“胸忍令”下的缺字应为“益州太守”四字，雍陟的生活年代主要在汉灵帝时期前后。近年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遗址在三峡文物抢救性发掘中出土了汉巴郡胸忍令广汉景云碑，为之立碑刊铭的正是继任胸忍令的“梓潼雍君讳陟字伯宁”，立碑的时间在东汉的熹平二年<sup>[8]</sup>。因此，雍陟之弟雍劝阙的建造年代也应当在汉灵帝时期，这正与该阙的形态特征相吻合。那么，早于雍劝阙的雍氏旧茔之阙即先锋村无铭阙，其年代就应当在雍劝阙之前，大概就是东汉后期的恒帝时期或稍早。

附：雍氏家族世系表

雍宝	雍望	雍陟
		雍朗
		雍劝 雍煜

后记：本文是国家文物局“中国古阙研究”课题的组成部分。

注释：

[1] 参看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徐文彬、谭遥、龚廷万、王新南《四川汉代石阙研究》1992年，文物出版社。

[2] 关于这一点，陈明达先生早已指出。参看陈明达：《汉代的石阙》，《文物》1961年第12期9~23页。

[3] 引自晋·干宝《搜神记》卷三，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本，1979年，第28、29页。汪绍楹校注此条说：“本条见宋章炳文《搜神秘览》（《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卷上）。按：宋费孝先善轨革，见《东坡志林》、《老学庵笔记》、《夷坚志》等书。此当是后人辑录时，因书名类似误收。应删正。”

[4] “边”字中古音为帮母先韵，“费”字中古音为滂母未韵，帮滂旁纽，先未可以旁对转。参看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

[5] 关于“杨公阙”解放后的变异情况，系已经故去的原梓潼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潘显猷先生见告。潘先生在梓潼县长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对家乡文物掌故了如指掌。他去世后，梓潼这些文物地情况恐怕再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熟悉了。

[6] 关于“杨公阙”的阙主，现有三种意见。清嘉庆修《四川通志》卷四说：“杨修墓在县北，有石阙，墓无考”。以为该阙为三国时期杨修之阙。清冯云鹏《金石索·石索》卷四说：“此阙当在蜀汉时，若在两汉间，则宜曰‘汉故侍中’，不宜曰‘蜀故侍中’也。考《蜀志》，杨氏人列传者三：……惟扬戏，字文肱，犍为武阳人，为尚书，右选部侍郎，又为治中从事，迁中郎参军，领梓潼太守，人为射声校尉。志所称清约不烦。此阙正在梓潼，岂其人欤？”又推测该阙为蜀汉时扬戏之阙。而清刘喜海《金石苑》第二册却认为：“蜀杨公阙在梓潼县，刻云‘蜀故侍中杨公之阙’。按《十六国春秋》、蜀李雄建兴六年以杨发为侍中，疑即其人”。

[7] 将多处原先有名字的古迹更改名字，这在平时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因为地方贤达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即使有人偷偷将原铭磨灭改刻，也不会得到地方知识分子的认同。这种根据自己意愿在古迹上模仿古人笔意雕刻新的铭文，还被地方人士当作古迹原有的铭文，这种事情只可能发生在地方人士已经完全不知道这些古迹的情况下。在四川，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清朝前期，也就是四川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大灾难以后。明末清初，四川连续经历了明朝军队与张献忠军队、张献忠军队与清朝军队、清朝军队与吴三桂军队的战争，四川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城市周围的固定居民几乎灭绝。梓潼县位于南北主要交通线上，与四川其他州县一样遭到乐战争的极大破坏。由于原住民已经所剩无几，地方文人社群更是已经消失，当外来移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再知道先前这里的文物古迹和历史掌故，这时候如果有人有在古迹上做些指鹿为马的事情，才又可能取得成功。

[8]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第97、98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